

中国农村扶贫的制度变迁、优化与创新

狄振鹏^a, 姚伟民^b, 李世美^a

(广西财经学院 a.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b. 教务处, 南宁 530003)

摘要: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扶贫制度也与时俱进,历经了改革变迁与优化创新,就理论成果和实践效果而言,扶贫制度在我国开展反贫困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不同时期的扶贫制度对减贫的效果不尽相同,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和发展进程,我国农村扶贫制度的变迁可以相应地划分为七大阶段,具体内容涉及:贫困区域判定的演变、贫困对象识别的优化、顶层设计的完善、扶贫主体类型的变化、资金注入方式的拓展、社会保障政策的补充、扶贫模式思路的创新等方面。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后扶贫”时代,农村扶贫制度需要不断创新、转型、升级,实现贫困治理能力现代化,最终实现全民小康、共同富裕。

关键词: 社会主义制度; 农村扶贫; 制度变迁; 全面小康

中图分类号: F32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2674(2021)01-100-07

一、制度对扶贫减贫的重要作用

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自然资源特点、历史文化背景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决定了扶贫制度的基本特征,并要求与其所处的历史阶段相适应,以保障农村扶贫减贫绩效实现最大化。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扶贫工作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来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扶贫制度变迁对我国农村扶贫减贫实现历史性突破发挥了重要作用。^[1]

制度是影响减贫的重要因素,贫穷问题根植于制度构架,尤其体现在经济和政治权利的分配合理性上。实行政治、经济、教育等全方位的制度改革,能够有效缩小贫富收入差距,提升贫困群体的消费水平,进而摆脱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循环积累。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正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的社会发展进步确立了政治前提和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制度吸收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先进成果,拥有公正、公平、先进、科学等根本优势,具有统筹调配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能够保障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农村扶贫制度的根本政治前提和理论依据。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能促使农村扶贫制度相应变迁、优化、升级,从而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符合政府对社

收稿日期: 2020-08-27

基金项目: 2018 广西财经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K9-9999-15-00-00-015); 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20YJA790039)

作者简介: 狄振鹏,广西财经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创新管理与扶贫研究; 姚伟民,广西财经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企业管理研究; 李世美,广西财经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社会经济学研究。

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及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进而最终全面消灭贫困人口,实现全民小康、共同富裕的伟大奋斗目标。^[2]

二、中国农村的扶贫制度变迁阶段划分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扶贫工作各阶段呈现出了不同的特征。总体而言,不同扶贫制度均能适应彼时的社会发展阶段进程,与历史文化、社会经济、自然资源等综合条件相匹配。虽然存在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在总体上发挥了制度对于扶贫减贫的积极推动作用。

1. 经济恢复时期的土地改革、农业改造、人民公社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面临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千疮百孔、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国家财政非常困难;农村经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耕作水平低下,农作物丰收与否严重依赖自然气候。

为了快速恢复国民经济,新中国提出了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方针,以拉动国民经济整体增长,减缓贫困发生。在该阶段,我国农村扶贫政策以“救济式道义扶贫”为主,扶贫形式相对单一,主要对遭受自然灾害的贫困群体进行社会救济、安抚安置,以及通过政府民政救济系统专项划拨救助资金的方式对农村特困人口和受灾群体进行救助,均属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道义性救助,贫困识别、救助方式相对粗放,其目标是解决绝对贫困人口的生存需求,稳定社会秩序。^[3]

1950年至1952年,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通过废除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土地私有制度,从根本上消除了农民被剥削而导致贫困的土地制度因素。1953年1月,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加速推进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包括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在此期间,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农民被纳入人民公社的组织体系,基本福利得到保障。

2. 初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农村保障制度特点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相对提高了16.8%。但在1957至1978年这一阶段,由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失误以及“三年自然灾害”等因素,导致我国农村扶贫工作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根据相关统计,1973至1977年,全国每年平均43%的省区粮食供应短缺,涉及人口规模近4亿,是同期农村人口总量的二分之一。截止到1978年,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为2.5亿,农村经济发展和扶贫工作面临着严峻考验。^[4]

在此阶段,农村扶贫工作以人民公社为主体,实行土地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农村集体经济和农业生产互助组采用的工分制,导致了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风气滋长,但同时也为绝对贫困人口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更大程度绝对贫困的发生。《农业发展纲要》提出的农村合作社对丧失劳动力、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社员给予一定照顾,发展成为了后来的“五保户”供养制度,实现了农村扶贫保障制度的创新突破,为后来的农村扶贫工作思路提供了一定借鉴。

3. 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经济改革与区域扶贫阶段

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率先从农业领域拉开帷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了土地制度的创新,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经济改革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奏响序曲。随着人民公社的解散,农产品购销、流通、价格体系等一系列制度改革,农村经济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迅速扭转了农村整体贫困的局面,贫困发生率由1979年的30.7%降到了1985年的14.8%。一方面,农村经济体制变革使农村普遍贫困局面得到了有效缓解;另一方面,我国加大对农村贫困救助的扶持力度,从资金、实物、技术等多方面给予帮扶,也使贫困群体逐步恢复生产发展。

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革创新,使国家整体贫困问题得以有效缓解。然而,因自然资源和历史因素等条

件限制,部分贫困区域未能跟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步伐,成为该阶段国家扶贫的重点对象。1980 年,国家设立“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定向扶持革命老区、少数民族集中贫困地区。1984 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将解决山区、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根据地和边远地区的贫困问题纳入政府工作重点,并将甘肃定西、河西和宁夏西海固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作为“三西”专项建设,列为国家计划。通过划分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方式,有利于实行定向综合扶贫开发,设立专项贷款和“以工代赈”专项资金,引领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发挥智力优势,在贫困地区传播科学技术,服务贫困区域发展。数据显示,这一系列措施有效缓解了集中连片地区的贫困现象,至 1985 年年底,贫困地区的大部分农村人口温饱问题得到解决,较 1978 年人均收入增长近 3 倍,贫困人口从 2.05 亿降至 1.25 亿,实现了农村扶贫工作的阶段性胜利。^[5]

4. 国务院扶贫办领导下的组织扶贫制度成形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水平随着开放程度快速提升,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缓,贫富差距日益明显。基于此,国务院在 1986 年 5 月正式成立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主要负责贫困地区经济开发政策的顶层设计,协调解决开发建设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同时,地方省、自治区、地市、区县也成立了对应机构,落实行政辖区内的扶贫工作。以此为标志,我国农村扶贫制度开启了新篇章,政府制定了贫困标准和贫困人口识别的方式,扶贫制度由原始的“道义性”救助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扶贫方式由传统的“外部输血”转变为鼓励“内部造血”。截止到 1992 年,农村绝对贫困人口降至 8000 万,组织扶贫效果显著,我国农村扶贫制度日益成熟化、高效化。

5. “八七攻坚计划”与开发式扶贫模式的建立与完善阶段

1994 年 3 月,国务院制定并发布了全国扶贫开发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和行动指南——《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成为我国历史上首个扶贫开发专项行动纲领。文件提出要用 7 年时间解决全国农村 8000 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我国农村扶贫工作由此进入攻坚阶段。该计划确定了 592 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贫困人口教育文化水平、发展区域支柱产业、异地开发试点等多种措施,改革扶贫资金的使用管理方式,加强贫困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交流协作。同时,还应积极开展同扶贫有关的国际组织、区域组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交流,鼓励贫困地区在国家扶持下发展生产,脱贫致富。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截止到 2000 年年底,我国农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数量降至 3000 万,农村贫困发生率降至 3% 左右,农村扶贫工作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

6. 农村扶贫新形势下的“三农”政策优化阶段

在新世纪到来的前 20 年里,我国解决了 2 亿多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农村普遍贫困现象得到有效缓解,贫困人口数量骤减,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01 年 6 月,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 年)》,提出要在 2001 年到 2010 年,集中力量加快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明确了新阶段农村扶贫工作面临的形势变化和严峻挑战,巩固了扶贫开发工程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在这一阶段,我国实施了教育、医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惠农政策。扶贫范围由区县细化到具体贫困村,划定贫困收入标准线。扶贫对象不仅面向尚未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还包括已初步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通过帮助他们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实现持续增收,巩固扶贫既有成果。经过十年共同奋斗,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持续下降,农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升,全面完成了农村最低保障制度建设,基本解决了贫困人口生存温饱问题。同时,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的成功实践也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5]

7. 消灭农村基本贫困后的系列精准扶贫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将脱贫攻坚工作上升到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形成了体系完

整、内涵丰富、旗帜鲜明的习近平扶贫开发重要战略思想。我国农村扶贫战略明确为“精准扶贫”，并制定了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总体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的脱贫攻坚奋斗目标，绘就了带领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决定性成就。到2020年，中国农村脱贫攻坚任务将全面收官，这意味着我国将彻底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赢得农村扶贫工作的历史性伟大胜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6]

三、中国农村扶贫制度变迁的优化与创新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救助式道义扶贫，到初步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转向有计划有组织的规模性开发式扶贫，再到新世纪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成功实践，中国农村扶贫、减贫工作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先进性，这与各个历史阶段扶贫制度在贫困区域判定、贫困对象识别、顶层设计规划、扶贫主体类型、扶贫资金来源、社会保障政策、扶贫模式与思路等多重维度的优化、升级、创新密不可分。

1. 贫困区域判定的演变

扶贫区域判定总体经历了贫困区域、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的变化过程，扶贫工作逐步细化、精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广大农村普遍处于贫困状态，重点扶贫区域主要为受自然灾害影响严重的地区，由政府给予道义性救助扶贫，缓解绝对贫困群体的基本生存难题。随着封建土地私有制度废除、社会主义制度确立、改革开放等历史进程推移，实现生产自由的农村生产力得到了极大恢复和发展，东中西部区域农村贫富差距日益明显。由此，国家开始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工作，并将扶贫工作上升至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地位。

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将因自然资源和歷史因素等条件限制而未能跟上社会经济改革发展步伐的地区作为国家体制扶贫的重点对象，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边远地区的贫困问题成为我国农村扶贫工作的重点。

1986年，随着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的成立，贫困区域范围得以明确，“国家确定的贫困县”数量为273个；1988年加入了牧区县、“三西”项目县；1994年按照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400元的标准，确定592个“国家级重点扶持县”；2001年将贫困地区概念调整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西藏自治区整体享受同等待遇，但不占用“贫困县”名额指标；2011年又确定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在贫困县基础上的范围扩大和概念补充。^[7]

2. 贫困对象识别的优化

贫困对象识别是农村扶贫工作的首要程序，决定着扶贫绩效成果和扶贫工作质量。我国农村扶贫制度中贫困对象识别的方式，经历了从以绝对贫困人口为核心到低收入人口与绝对贫困人口同样重视的变化，并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而不断调整贫困标准。^[7]

1986年，国家统计局以解决绝对贫困人口基本生存需求为标准制定了农村贫困对象识别标准，并根据物价水平浮动做出了相应调整。1995年开始采取国际通用的测算贫困标准“马丁法”，根据“食品贫困线”制定“消费贫困线”作为贫困识别标准。1998年调整为根据恩格尔系数计算农村低收入标准并公布，但依然以既往的绝对贫困标准作为识别依据。从2008年开始，我国取消绝对贫困标准，将低收入标准作为贫困识别依据并沿用至今。在大幅提高贫困人口识别收入标准的同时，将低收入人群全部纳入扶贫对象。^[8]将低收入人群全部纳入农村扶贫对象，是我国农村扶贫制度贫困对象识别方式的历史性跨

越。在实现救济和保障绝对贫困人口的同时,让低收入群体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缩小贫富收入差距。

3. 顶层设计的完善

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农村扶贫领域的专项纲领性文件尚属空白。1957 年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提出,人民合作社承担丧失劳动力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社员的保障职能,后来随着历史发展演变成为“五保户”供养制度。1986 年 5 月,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负责制定贫困地区经济开发政策。1994 年 3 月,国务院发布《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成为我国历史上首个扶贫开发专项行动纲领性文件。2001 年 6 月,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 年)》,这是我国农村扶贫工作的第一个十年计划。2011 年以后,一系列针对农村扶贫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先后出台,其中包括《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等系列文件,文件数量、内容细化程度均为历史之最。针对农村扶贫制度作出细化和调整,开创了贫困户建档、精准扶贫责任制、产业扶贫制度等方面的创新。^[9]

4. 扶贫主体类型的变化

农村扶贫工作参与主体,经历了早期政府完全主导,到成立专职扶贫组织定点扶贫,再到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并加强国际机构交流合作的转变过程,参与主体类型日益丰富。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扶贫主体由政府民政系统负责,人民公社、生产队集体协同参与。1993 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后改名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地方省、自治区、地市、区县同时成立对应机构,落实行政辖区内的扶贫工作,农村扶贫体制系统建立。此后,政府机关定点帮扶模式常态化,东部发达地区开始对口参与西部地区扶贫工作,以政府为主导、行政组织为主要依托的管理型扶贫制度体系逐步完善,教育、科技、医疗、基础设施等行业扶贫制度逐步建立,社会力量参与更加广泛,扶贫减贫效率得以进一步提升。

5. 资金注入方式的拓展

我国农村扶贫工作起步阶段,扶贫目标主要是解决绝对贫困群体的生存问题,通过政府民政系统发放救助资金、实物,人民公社承担绝对贫困社员的最低口粮兜底。专项扶贫制度建立后,中央财政划拨扶贫专项资金用以支持贫困地区脱贫。除直接划拨财政扶贫专项资金外,扶贫资金注入渠道、使用方式也在不断创新。农村扶贫各历史阶段,以工代赈、信贷资金转移调控、扶贫贴息贷款、企业专项贷款、贫困户扶贫小额信贷、公益彩票事业支持、扩大农业保险等多种资金注入方式,提高了农村扶贫资金的分配效率和使用灵活度,充分发挥了金融机制对扶贫减贫的积极作用。^[10]

6. 社会保障政策的补充

社会保障政策的演变同样贯穿了中国农村扶贫制度变迁的主要脉络,主要涉及社会救助、最低生活保障、新农村医疗合作、养老保障制度、义务教育入学保障、卫生保健制度、计划生育政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文明家园”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等制度保障,成为扶贫减贫的制度基础,为消灭农村绝对贫困、改善民生、提升贫困地区人口综合素质、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做出了重要贡献。

7. 扶贫模式思路的创新

2016 年 7 月,习近平主席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指出:“摆脱贫困首要并不是摆脱物质的贫困,而是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农村扶贫工作开始在以往单一物质性帮扶的基础上,以智力帮扶、意识帮扶为补充,重视农村社会文化教育对扶贫工作的重要作用,加大教育、科技、文化帮扶的投入力度,注重解决贫困地区精神贫困、文化贫困问题,调动贫困人口的主观能动性,帮助贫困地区实现自我积累与自我发展。^[11]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农村扶贫制度随着历史的进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丰富变化、改革创新。

党和政府始终把农村扶贫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科学发展、协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农村扶贫道路上坚定不移,实现了贫困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和制度创新,先后带领着数亿人民群众脱贫致富、走向安定幸福的生活,对世界反贫困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到2020年年底,中国将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农村脱贫攻坚任务将按照现行贫困标准全面收官,并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意味着我国农村扶贫工作将取得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接受人民和历史的检验,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彻底画上句号。

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的农村扶贫工作展望

每一个贫困县摘帽,都是全国脱贫攻坚战役的一场局部性胜利,但并不意味着贫困问题的彻底消灭。取得农村扶贫工作“先手棋”胜利后,如何做好贫困县摘帽后的“棋后招”,是对我国贫困治理体系的重大考验,这关系着全面小康的建设质量和人民群众对脱贫攻坚战役完成度的满意指数。“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的贫困县“摘帽四不摘,脱贫不返贫”准则,为即将到来的全面小康社会时期农村扶贫工作指明了方向。

为应对新时期、新形势下所要面临的全新挑战,我国农村扶贫制度可以从以下维度进行优化创新。

1. 巩固扶贫成果,建立防止返贫监测机制

脱贫攻坚是关系数千万人的一场硬仗,关系着人民群众的民生,贫困县摘帽、贫困人口摘下贫困帽并不意味着贫困问题在该区域被彻底消灭和解决,脱贫之后的返贫现象能否得到预防并稳妥解决,不仅关系到脱贫攻坚战役的完成质量,而且更能检验我国贫困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

在消灭绝对贫困、消除区域基本贫困后,贫困对象识别方式需要进一步细化,对贫困识别标准测定、指标选取、群体界定、区域划分应持续精准化,完善贫困人口动态进退机制,建立预防返贫监测和帮扶长效机制,融合监测预警、防贫保险、产业扶贫、精准防贫等保障手段,建立、补充、完善农村各项社会保险制度和普惠金融制度,消除脱贫人口因病返贫、失业返贫、因学返贫、因灾返贫隐患。^[12]同时,应根据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不断调整预警监测红线,对非持续稳定脱贫户、易返贫的脆弱群体和边缘群体实施“提前预防、返贫帮扶、跟踪保障”的复合型保障措施,持续巩固脱贫攻坚胜利成果。^[13]

2. 优化标准制定,调整贫困瞄准合理机制

贫困识别标准应当适应社会发展进程,取消绝对贫困标准和低收入标准的界限,将农村低收入群体全部纳入监测对象的范围。同时将易返贫的脆弱群体和边缘群体纳入扶贫检测对象的范围,实行动态进出管理制度,侧重农村人口生产力水平提高和自我发展意识改善,对丧失劳动力的特殊贫困人口实行政策兜底社会保障,探索、优化低保制度方案,将预防返贫、缩小城乡贫富收入差距作为新时期农村扶贫工作的重点。

3. 培养内生动力,实施人力资源开发战略

自我国农村扶贫救助方式由道义式救助扶贫转为开发式制度扶贫以来,提高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帮助贫困人口实现“自我造血”成为农村扶贫工作的重点。在新时期农村扶贫工作中,要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科技、文化等行业扶贫投入力度,提高农村人口整体受教育水平,加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培训力度,组织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参加职业技能和实用技术培训,保障“智力扶贫”与“志力扶贫”措施的长期可持续性。

4. 持续跟踪帮扶,加大扶贫政策倾斜力度

长期受贫困问题困扰的地区,大多受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历史文化因素等多方面条件的限制,自身

发展基础薄弱。随着扶贫工作的长期深入,“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目标大都能够实现,但长期贫困积累的产业短板和基础设施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未来农村扶贫工作将面临更多细致、艰苦的工作,缩小脱贫区域与发达地区的收入差距,弥补欠发达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产业结构滞后等发展短板,将成为摆在农村扶贫工作面前的新命题。因此,新时期农村扶贫工作需要将更多的便民政策、优惠措施持续向欠发达地区倾斜,创新资金投入和财政注入方式,实施更多接地气、精准发力的帮扶政策,实现长期跟踪可持续。

5. 优化考核评估,强化监督管理制度建设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贫困问题是社会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这揭示了我国反贫困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在即将迈入的全新反贫困时期,应坚定发展步伐,加大监督力度,优化反贫困过程监督和考核评估模式。同时也要预防、整治扶贫领域的贪腐问题,从而持续巩固反贫困成果,满足欠发达地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在即将到来的全面小康社会,要充分认识到脱贫攻坚对于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意义,发挥贫困地区基层党组织在扶贫攻坚中的战斗堡垒作用。^[14]中国农村反贫困工作将进入全新的阶段,应吸取历史经验,发挥制度优势,持续变革创新,提高农村反贫困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 [1] 张琦,冯丹萌.我国减贫实践探索及其理论创新:1978~2016年[J].重庆:改革,2016(4):27-42.
- [2] 黄承伟.中国扶贫开发道路研究:评述与展望[J].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5-17.
- [3] 曹永红.扶贫开发怎样走好国际合作之路[J].北京:人民论坛,2016(32):52-53.
- [4]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中心课题组.论中国扶贫开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J].北京: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5(1):124-130.
- [5] 房连泉.国际扶贫中的退出机制——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J].北京:国际经济评论,2016(6):86-104+6.
- [6] 谢撼澜,谢卓芝.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研究[J].重庆:探索,2017(5):142-150.
- [7] 陈志钢,毕洁颖,吴国宝,等.中国扶贫现状与演进以及2020年后的扶贫愿景和战略重点[J].北京:中国农村经济,2019(1):2-16.
- [8] 徐映梅,张提.基于国际比较的中国消费视角贫困标准构建研究[J].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6(1):12-20+29.
- [9] 许汉泽.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反贫困的历史、经验与启示[J].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45-52.
- [10] 庄天慧,张海霞.开放包容:新中国70年贫困治理的经验和逻辑[J].成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11):144-152.
- [11] 罗江月,唐丽霞.扶贫瞄准方法与反思的国际研究成果[J].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10-17.
- [12] 周再清,李亚男,杨杰钦.武陵山区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研究[J].南宁: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18(6):22-31+107.
- [13] 黄承伟.习近平扶贫思想体系及其丰富内涵[J].武汉: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6):129-133.
- [14] 夏飞,宋勇刚.充分发挥贫困地区基层党组织扶贫攻坚战斗堡垒作用[J].南京: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17(6):1-4.

责任编辑:张 旭